

○当代教育家思想研究 主持人:韩延明

主持人语:古人云:“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王充曰:“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我国高教泰斗、学界楷模潘懋元先生,作为一位挥笔数十载、赤诚育英才、影响国内外的睿智教育家,以高境界的自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以卓越智慧和巨大勇气奋力开拓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学科发展道路,建立了高等教育学这门“中国创造”的新兴学科,并一直与时俱进地设计和引领着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踔厉发展、勇毅前行。他始终在教书育人中抱诚守真、茹古涵今,一直在学术研究上通幽洞微、钩深致远,育学生成长和成熟,授学生知识和智慧,教学生做事和做人,用热血浇灌他的文字,用心雨滋养他的学生,“由诚而成懋业,敢闯而创新元”,倾情演绎了其丰富而传奇的教育人生。他不仅是一位卓越的教育理论家,而且是一位出色的教育活动家和教育战略家,被学界称为中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长青树”和“不老松”。据不完全统计,他撰写和主编的著作有50余部、论文500余篇。可以说,潘先生一生心念的都是教育。他是一座奇崛的高等教育研究巅峰。

本期我们隆重推出了著名学者别敦荣(与李家新合作)、陈斌系统研究潘懋元高等教育思想的两篇文章。别敦荣、李家新指出,潘懋元高等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内蕴丰厚、体系完整,几乎囊括和覆盖了高等教育研究的所有领域,主要包括为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的元高等教育学思想;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擘画了清晰的总体蓝图的高等教育宏观发展思想;为高校办学和人才培养工作的完善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的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思想;以及为大众化时期我国不同类型的高校指明了合理的发展路径的高等教育分类发展思想等。陈斌则从探析潘先生的研究生教育思想入手,深情而深刻地诠释了潘先生作为我国高等教育学的首位硕导和博导而言传身教地践行“一位好老师”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扎实学问、仁爱之心”的博大胸怀和育人风范。

潘懋元高等教育思想论纲*

别敦荣 李家新

(厦门大学,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潘懋元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和著述文献是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宝贵财富,不只影响了中国的高等教育理论发展和实践走向,而且受到国际高教界的重视。他的高等教育思想结构严整、体系庞大,几乎覆盖了高等教育研究的所有领域。总体上看,他的高等教育思想主要包括以高等教育学科范式思想、教育基本规律思想等为代表的元高等教育学思想;以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道路思想、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思想、终身教育思想等为代表的高等教育宏观发展思想;以高校课程与教学论思想、高校教师教育与教师发展思想等为代表的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思想;以及以民办高等教育发展思想、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思想、应用型本科教育发展思想等为代表的高等教育分类发展思想,等等。他的高等教育思想不但是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基石,而且对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发挥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 潘懋元;高等教育思想;高等教育研究;高等教育学科

中图分类号: G649.29 **文章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6800(2015)-07-071-14

我国现代高等教育研究已有百余年历史,大致可以分为前学科时期和学科化时期。自20世纪50年代,潘懋元开始涉足高等教育研究,且从一开始就致力于高等教育学科建设。他可能是唯一一位纵贯两个时期的学者,不仅首开高等教育学科化之先河,而且一直站在高等教育学科最前沿,深耕不辍、持续至今,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界的常青树。他的学术成果丰富多样,学术思想深刻系统,几乎覆盖了高等教育研

*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创造性人才培养与大学教学文化研究”(14JJD880002)

作者简介:别敦荣,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家新,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究的所有主要领域。他的高等教育思想是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基石,是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理论的宝贵财富。不仅如此,他在繁荣和引领高等教育学科发展的同时,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在各级各类高校向广大高校领导、管理人员和教师传播科学的高等教育思想,指导高校办学与科学发展。他视野宽广,胸怀博大,长期关注和重视国家高等教育走势,将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政策变革纳入自己的研究范畴,为制定科学的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政策做出了不遗余力的努力,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因为如此,潘懋元高等教育思想已经成为高等教育学科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据不完全统计,高教界已出版相关研究著作 10 余部,发表相关学术论文数百篇,尤其是部分港台和外国学者加入研究队伍,更显潘懋元高等教育思想的广泛影响。笔者深知相关研究已经比较深入和全面,但却无意做一个相关研究文献的综述,而是要深入原始学术成果中去,对他的学术思想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剖析,以期从总体上概览潘懋元高等教育思想的全貌。

一、元高等教育学思想

与西方高等教育研究的“问题取向”不同,我国近三十余年的高等教育研究呈现出“学科取向”的特征,即以高等教育学科的建设为基础和依归,开展高等教育相关问题的研究。一般认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学科化时期始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潘懋元编写《高等教育学讲座》和推动“高等教育学”进入学科专业目录为主要标志。在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从“前学科时期”走向“学科化时期”的过程中,作为高等教育学科的创始人,潘懋元关于高等教育学科建设与高等教育基本理论建设的“元高等教育学思想”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不仅从整体上统领着潘懋元本人的高等教育思想与理论体系,也在很大程度上引领了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总体发展方向,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重要理论基点。

(一)高等教育学科范式思想

虽然国内外关于高等教育相关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如前苏联曾于 20 世纪 40 年代提出“高等学校教育学”概念,但真正系统地探究高等教育规律,并将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加以研究和建设的,无疑始自以潘懋元为主要代表的新中国第一代教育学家。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潘懋元对于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初步探索始自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早在 1956 年担任厦门大学教育学教研部主任、为高校干部开设教育学讲座时,他就意识到了区别于普通教育的高等教育的特殊性问题。他认为,高等教育具有与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直接联系的专业性,是建立在普通教育基础上的专业教育;大学生是十八九岁以上的青年人,身心发展特征与社会经验上与中小学学生具有明显不同。^{[1][5]}因此,高等教育是教育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并不能将普通教育学的一般原则、理论简单地移植于高等教育领域中。基于此,潘懋元倡导、筹划并组织了“高等学校教育学”课程的开设与《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的编写。这部讲义第一次明确地提出要建立一门“高等专业教育学”或“高等学校教育学”,并对高等教育的定义、特点,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和基本定义,高等学校的教育问题和教学方法等问题进行了界定、探讨,为此后高等教育学科及其范式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理论与文献基础。

在因政治运动等种种原因中断研究二十多年后,潘懋元于 1978 年重启高等教育研究工作,而他此时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无疑是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从当时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需要、高等教育本身面临的特殊问题,以及教育科学的整体发展出发,潘懋元提出应尽快建立高等教育学科,实现高等教育研究的科学化、学科建制化,希望通过理论研究探索高等教育规律,并以此指导高等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2][19]}在重申高等教育特殊性的基础上,潘懋元以“高等教育学”概念取代了此前的“高等学校教育学”,正式将其作为整个教育科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这一分支学科同教育学的关系,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教育学,研究的是教育科学共同的、一般的规律,学前教育学、普通教育学、高等教育学以及其他分支学科,研究的是各自的特殊规律。”^{[2][23]}1981 年,潘懋元开始组织编写我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著

作。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对高等教育学的理论体系与研究内容进行了结构化、体系化的总结与归纳,其内容系统地覆盖了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任务与意义,高等教育的性质、任务、目标,及其体制、制度、发展历史,以及高等学校的特征、职能、管理,及其教学过程、原则、方法等诸多领域,初步构建了高等教育学的学科体系与理论框架,集中展现了潘懋元早期的高等教育学科范式与学科建设思想。在学科理论研究全面展开的同时,我国第一个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于1978年在厦门大学建立,第一个学术团体“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于1983年在北京成立,高等教育学于1983年第一次作为教育学的二级学科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纳入学科专业目录,厦门大学分别于1984年、1986年获批全国第一个高等教育学硕士、博士学位授予点。这些高等教育学的学术组织和学位点的建立使高等教育学的建制化在我国得以实现,为高等教育研究和学科发展提供了组织保证。高等教育学建制化的每一个进步,都饱含潘懋元对高等教育学科建设信念的坚守与执着,渗透了他领导创建高等教育学科的艰辛付出与贡献。

在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过程中,曾出现所谓“学科”与“领域”之争。有人质疑,高等教育研究并不具备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条件,只能作为一个围绕高等教育相关问题所形成的研究领域,这与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研究者,如阿特巴赫(Philip Altbach)等人的论断基本一致。面对争议,潘懋元并没有简单地否定这种质疑,而是指出学科与研究领域并非对立的概念,二者也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研究领域指的是有一定的研究对象的范围,而学科的首要条件正是特殊的研究对象。高等教育学由于有它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研究对象,更由于它有其特殊的不同于普通教育的规律,因而可以构成一门独立的学科。至于理论体系、专门术语、方法论体系等,只有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不断成熟。确切地说,它既是一个研究领域,也是一门正在走向成熟的学科。”^{[2](427)}在坚持高等教育研究科学化、学科化的基础上,潘懋元吸收融合了“研究领域论”背后的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论,极大拓展了高等教育研究的问题域与方法体系。随着潘懋元高等教育学科范式思想的不断发展,与高等教育实践紧密相关的问题,无论是一般的还是特殊的、宏观的还是微观的,都逐渐在他的理论研究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以多学科、跨学科研究为代表的方法论体系也得以逐步形成。在他的思想指引与亲力亲为之下(如组织编写《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等著作),高等教育学的分支学科,如高等教育管理学、高等教育经济学、高等教育史等逐渐得到发展、繁荣,形成了体系完整、结构清晰的学科群、问题域和方法体系。这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发展已大大超越了普通教育学的研究领域与理论体系,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学科范式与学科建设路径。

根据科学学的定义,“范式”意味着科学家共同体所共享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等的集合,其在本质上具有“范型”与“典范”的意义。^[3]纵观我国三十多年来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可以发现其大体上遵循了潘懋元的高等教育学科范式与学科建设思想,是在这一思想基础上的进一步生长。这实际上说明了,潘懋元之所以被公认为高等教育学科的创始人,不仅是因为他开展高等教育研究与学科建设探索的时间最早、持续时期最长且贡献卓著,更因为着他通过自身的思想与实践,开创了最具典范意义和现实影响力的学科范式。

(二)教育基本规律思想

教育是有规律的。对教育基本规律的认识与阐释是潘懋元高等教育思想中最重要、最核心的内容之一,也是他本人及诸多学者开展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文革”结束后不久,理论界开展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关于教育究竟是“上层建筑”还是“生产力”的论争。在这场论战中,各方都有其合理的论证,虽未形成统一的结论,但却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唤醒了人们对教育基本理论问题的关注。潘懋元不仅参与了这场论争,更为重要的是,他开始着重思考教育与社会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关系。在他看来,高等教育发展在历史上出现的种种失误,是因为教育与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不相适应,即违反客观规律所致,故而在高等教育学科发展中,研究高等教育发展规律是解决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根本问题的关键。他认为,人与社会是教育的两端,而教育是人与社会关系的中介,因此,可以从教

育“促进人的发展”与“促进社会发展”两大基本功能入手,探索、归纳教育的基本规律。1980年在湖南大学讲课时,潘懋元第一次正式提出“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并在此后编写《高等教育学讲座》等著作时对其进行了表述上的修正。在这些论著中,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通常简略表述为“教育必须与社会发展相适应”^{[4](1)},教育的内部关系规律则一般表述为“教育必须全面地协调德育、智育、体育、美育,使学生全面发展”或“教育必须通过德育、智育、体育、美育,使受教育者全面发展”^{[2](523)}。就二者的关系而言,教育内部关系规律的运用要受外部关系规律的制约,而外部关系规律又只能通过内部关系规律来实现。^{[5](13)}

虽然关于教育基本规律的认识广泛地存在于前人的著述中,但潘懋元是明确以“内外部关系规律”来指称并系统阐述教育规律的第一人。教育基本规律思想的提出,对当时的教育理论研究、教育实践探索,尤其是高等教育研究与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且这种影响一直延续至今。首先,教育基本规律思想贯穿了高等教育研究科学化与学科化的全过程,推动了高等教育学科理论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潘懋元主张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必须超越一般意义上的问题研究,应当建立科学化的学科理论体系。科学理论体系的建立,通常需要有一种形式简单,但又提纲挈领、统摄全部研究范畴的基本规约或基本思想。理论界在学科建立之初曾就高等教育学的“逻辑起点”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过论争,但并没有达成共识,而教育基本规律思想的提出,则在事实上弥补了这一理论缺憾,使高等教育学的理论体系、基本范式的建立有了较为稳固的基础。无论是对潘懋元本人还是对其他研究者,无论是对当时还是现在的高等教育研究,教育基本规律思想都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与牵引作用。潘懋元浩繁的研究领域中的诸多议题,比如,高等教育与商品(市场)经济的关系、高等教育与文化传统及文化创新的关系、新科技革命对高等教育的挑战、高校的教学原则与教学方法,等等,几乎都建立在其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思想的基础之上,是对教育基本规律思想的具体应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基本规律思想是潘懋元高等教育思想体系的核心之所在。

潘懋元的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提出后引起了教育界的广泛关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教育理论与实践工作者的认识与思维方式,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宏观发展与微观改革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尽管其确实引发了一些争议和讨论,但这客观上更促进了这一思想的传播与完善。随着教育基本规律思想在教育研究与实践中的广泛运用,其科学性也不断得以证明。比如,潘懋元基于教育外部关系规律对高等教育与市场经济关系的把握,在很大程度上预估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趋势;他基于教育内部关系规律提出的大学素质教育思想,为当代大学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并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国家各级教育主管部门的教育决策。由此可以看出,潘懋元之所以能够在高等教育方面做出诸多具有前瞻性、预测性的理论成果,并能为我国高等教育政策制定、高等教育实践发展提供适切的指导,一方面缘于他有着长期的、丰富的研究与实践经验,另一方面即因为他牢牢把握、合理地运用了教育的基本规律思想。

二、高等教育宏观发展思想

理论的价值有如太阳和月亮,不仅光耀星空,而且普照大地。潘懋元高等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其并不是从理论到理论的抽象建构,而是与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息息相关,与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既有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问题、普遍问题的关注,也有对不同高等教育类型的关切;既有对高等教育事业宏观发展方向、变革路径的把握,也有对高等学校内部微观事务的体察。概而言之,潘懋元的高等教育宏观发展思想主要由三大部分构成。

(一)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道路思想

在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上,我国是后发国家。尽管我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并没有照搬任何国家的模式,但不可否认,“依附论”的影响在各个时期都有着明显的表现,自主发展往往处于式微之势。在高等

教育研究中,“依附论”也很有市场。潘懋元的高等教育思想表现出鲜明的文化自觉意识,在其高等教育宏观发展思想中,中国道路思想占有重要地位,它体现了潘懋元对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基本立场的宏观把握,是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路径的战略设计。从思想源流来讲,潘懋元的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道路思想与其比较高等教育思想密切相关。作为我国最早从事比较高等教育研究的学者之一,潘懋元见闻广博、阅历丰富,在他思想的形成过程中,曾学习或接触国内外各种教育思想。他曾将自己的学习经历戏称为“封”、“资”、“修”:所谓“封”,是指早年他的学习经历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对中华民族的固有文化与道德伦理形成了较为深刻的认识;所谓“资”,是指青年时期他曾大量接触、学习西方的教育理论,尤其是美国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所谓“修”,是指在建国初期他又大量学习、实践了前苏联的教育理论。^{[6](114)}在融汇国外多种教育理论、学说,以及高等教育发展的比较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潘懋元萌发了关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创造性认识。在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拨乱反正、走上正常的发展轨道之初,他即清醒地意识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不能抱残守缺、固步自封,需要从各种教育思想、教育模式中不断汲取营养,但也不能丧失自身的特色与主体性,唯“洋”是瞻,而应努力提升自身的文化自觉,立足于本国实际,通过借鉴、超越与创新,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对于处于变革转型中的中国高等教育来讲,潘懋元的中国道路思想明确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立场与发展方向。在全球化浪潮兴起的时候,西方学者提出的“依附论”曾一度引起我国高等教育界的重视。“依附论”学者阿特巴赫认为,西方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分别处于世界学术系统中的“中心”与“边缘”地位,二者之间存在控制与被控制的不平等关系,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在教育、学术领域中,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都存在无法避免、不可逆转的依附,未来似乎也只能在这一格局之下走依附性发展的道路。这种思想得到我国一部分学者的认同,他们援引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初期曾移植、模仿日、德、美和前苏联等国教育模式的客观事实,认为依附理论可以解释清末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中国与西方国家确实存在教育与学术上的“边缘—中心”关系,且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难以摆脱这种依附发展的局面。^{[7](11)}潘懋元从理论与现实两个维度对“依附论”进行了批判。在理论维度上,他提出依附理论是站在强势的西方文化立场来为东方代言,只强调教育的外部因素,而对第三世界的民族文化、政治体制等内在发展动力置若罔闻;在现实维度上,他认为依附理论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近代发展同样缺乏现实解释力。对西方教育模式的借鉴固然是所有“后发外生型”国家在高等教育发展初期的必经之路,但从我国的情况来看,所谓的“依附”是在逐渐减少的,随着民族性和本土性的日渐浓厚,中国的高等教育事实上也在不断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独特模式。在《借鉴——超越:中国高等教育自主发展路径研究》一文中,潘懋元进一步从“学术理念”、“学术语言”与“学术评价”三个角度阐述了影响中国高等教育自主发展的相关问题。^{[8](174)}在此基础上,潘懋元提出“借鉴——超越”论,认为中国高等教育百年来的发展实际上是一个学习、借鉴西方但有所创新的过程。通过大胆创新与不断超越,中国完全能够走上一条非依附发展的道路。尽管他关于这一思想的明确表述是在与“依附论”的论争中提出的,但是,从潘懋元高等教育思想的总体脉络来看,中国道路思想实际是他一贯的立场与主张,贯穿于他对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整体设计之中。比如,在建构高等教育的理论体系时,他始终坚持对学科建制与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注,开创了与国外“问题领域式”高等教育研究截然不同的中国高等教育学科体系与学科范式;在研究高等教育大众化问题时,他将马丁·特罗(Martin Trow)的理论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最终对大众化理论进行了适应性修正,并影响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在研究高等教育国际化问题时,他认为应将“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要在引进国外有益的教育思想与教育模式并保持自身主体性的同时积极作为。高等教育的中国道路思想体现了潘懋元对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立场,在他的教育思想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思想

大众化是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20世纪中期以来在东西方很多国家中都得到了实践。美国学者马丁·特罗最早对这一现象开展理论研究,他从美国、西欧等国的高等教育发展经验出发,提出了著名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这一理论认为,高等教育“量”的增长将引起“质”的变化,当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进入15%以上的大众化阶段后,高等教育的观念、功能、模式、管理,以及与社会的关系等都将发生一系列的改变。^{[9](2)}为此,教育政策与教育制度应当进行相应的变革调整。大众化理论提出后,对世界许多国家的高等教育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引起我国高教界的重视。由于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上,比如,1980年毛入学率仅为2.22%,到1996也仅为8.03%^[10],大众化、普及化直到20世纪末都还几乎是无法想象的事情;不少人认为,大众化理论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大众化所引发的教育质量、学生就业等问题是中国无法承受的。然而,通过研究20世纪后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以及新世纪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潘懋元运用教育外部关系规律的理论武器,敏锐地捕捉到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性契机,指出中国高等教育需要“适度超前发展”,^{[1](365)}大众化道路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有鉴于此,他开始组织学生译介、研究马丁·特罗的有关论著,成为国内最早开展大众化相关问题研究的学者之一。在研究的理论视角上,潘懋元并没有拘泥于马丁·特罗的思想,而是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开展适应性研究。通过研究,他发现马丁·特罗的理论并不足以完全解释我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进程,我国在距离毛入学率15%的大众化底线标准很远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若干大众化,甚至普及化阶段的特征,是一种“质变先于量变”的发展,即存在一个质的局部变化先于量的总体达标的“过渡阶段”。^{[6](219)}这一发现有力地弥补、修正了传统大众化理论的不足,为大众化理论在“后发外生型”国家的实际运用提供了适应性基础。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潘懋元开始全面思考与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紧密相关的种种议题,最终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思想。

潘懋元的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思想首先体现在他的高等教育结构观上。他认为,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应该以多样化为前提,用传统的办学思路、办学手段来实施、规范大众化时代的高校办学既不经济、也不科学;用传统精英教育的标准来引导、衡量大众化时代的高等教育更是一种误导。因此,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需要正确定位高等学校的层次、结构与指向,以全面适应大众化时代的高层次人才需要。在洞悉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精准透视高等教育发展可能的基础上,他指出发展民办高等教育、高等职业教育与鼓励高等教育通向农村等方式是实现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要途径,因此在这些方面组织开展了大量的原创性研究。比如,他指导的博士学位论文《高等教育通向农村研究》(高耀明著)就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高等教育通向农村相关问题的著作。同时,他还明确指出,在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中应高度重视对传统精英教育的保护,不能将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视为矛盾对立、非此即彼的概念,大众化时期的高等教育既应包括大量培养专业性、应用性、职业性人才的大众教育,也应包括一定比例从事高深学问研究与传播的精英教育,^{[11](16)}即应重视高等教育定位、分工与层次的合理化。此外,潘懋元的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思想还体现在他的高等教育质量观上。他提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前提是办学模式的多样化,而其核心在于教育质量的多样化。^{[6](219)}在大众化阶段,不同的高校处于不同的层次,拥有不同的教育目标与社会适应面,自然也应具有不同的规格与质量标准。高校招生规模的扩张,并不一定意味着教育质量的下降,通过保证高等教育的“适度超前发展”,为不同类型、层次的高校建立不同的评估标准与指标体系等方式,大众化时代的教育质量问题是能够得到有效解决的。

潘懋元的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思想与其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道路思想一脉相承,互为衬托,共同影响了他的高等教育结构观与质量观,为当代我国高等教育快速、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纵观近20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其基本上遵循了潘懋元当时的判断与预测。

(三)终身教育思想

“终身教育”理念是由法国学者保罗·朗格朗(Paul Lengrand)于1965年召开的“成人教育促进国际

会议”上提出的,其意涵主要包括:一是指教育应贯穿人的一生,使每个人都能在任何时候接受教育,从而更好地适应社会需要,实现自己的抱负;二是指教育应打破封闭、固化的学校体制,统合社会中各种教育与培训渠道,使每个人“在其生存的所有部门,都能根据需要而方便地获得接受教育的机会。”^{[12](79)}按照朗格朗的思想,终身教育并不是指某种具体的实体,而是泛指一种抽象的思想或原则,类似于我国古语所说的“活到老,学到老”。正因如此,虽然终身教育概念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形成共识,关于终身教育的实现方式,迄今仍存在不小的争议。

潘懋元是我国最早关注、重视终身教育的学者之一,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进行学科建设的初步探索之时,他就考虑到传统的高等院校之外的高等教育形式有可能在未来的教育体系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高等学校教育学”这一称谓显然无法涵盖非学校形式的教育,因此,他坚持使用“高等教育学”来命名新学科。^{[13](4)}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终身教育思想在其理论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首先,在对终身教育的价值与意义的理解上,潘懋元指出,终身教育与高等教育存在紧密的联系,它代表了高等教育发展的一大重要趋势,甚至在很大程度上预示着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方向。在开展高等教育大众化相关问题的研究时,他开始关注并引介日本学者有本章(Arimoto Akira)的“后大众化阶段”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当大众化进入后期阶段,不仅适龄青年继续增加并最终进入普及化阶段,越来越多的成年人也会为了满足工作和生活需要多次进入高等院校接受继续教育,高等教育的后大众化阶段很可能出现终身学习社会。^{[6](217)}潘懋元看到了终身学习社会的意义,并结合对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过程中“质变先于量变”的“过渡阶段”现象的考察,认为中国有可能借助于现代远程教育、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和各类培训班等方式,超前或部分融入终身教育体系。他在《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一书中高屋建瓴地指出,教育对人类而言是永恒的,而高等教育则只是一个历史概念;随着实践的发展,高等教育可能已无法涵盖中学后的多样化教育,而应使用“第三级教育”、“中学后教育”来标示,也就是说,未来的高等教育很可能是终身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14](51)}由此可见,潘懋元对终身教育的理解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现实或现象层面,而是从时代发展、历史趋势的高度来认识终身教育的现实意蕴。

其次,在对终身教育的意涵与实现路径的研究中,潘懋元并没有拘泥于国际上的理论争议,或照搬国外的相关经验,而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谋划具有中国特色的终身教育建设之路。在对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教育结构体系,以及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阶段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他提出终身教育体系本质上是一个包含所有教育形式的复合系统,我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普及化发展不能仅仅依靠普通高校这一种形式,也应大量依靠远程教育、自学考试等多种教育形式,通过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的结合,国民教育体系与非国民教育体系的结合,我国将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实现终身教育体系与学习型社会的建立。基于此,潘懋元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他所指导的博士学位论文《我国成人高等教育转型的研究》(余小波著)、《自学考试制度研究》(康乃美著)等,大大丰富了人们对终身教育及其实现方式的认识。

潘懋元的终身教育思想与其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道路思想、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思想构成了一个关于我国高等教育宏观发展的思想体系。中国道路思想体现了潘懋元对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立场,大众化思想体现了他对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态势的总体构思,终身教育思想则体现了他对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的长远预期。在这三种思想所框定的理论架构下,潘懋元组织开展了大量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工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宏观发展提供了许多具有科学性、建设性与创新性的思想和动议。

三、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思想

潘懋元的高等教育思想不仅关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宏大叙事与宏观命题,同样关涉高等学校所面

临的具体事务与微观问题。从潘懋元关于高等学校内部事务的研究与论著来看,他关注最早、着墨最多的,无疑是高校的人才培养与教育教学问题,这正是教育内部规律所约束的范畴,也是统摄高校内部绝大多数事务的核心问题。具体说来,他的相关著述主要聚焦于高校课程与教学和教师教育与教师发展两大领域。

(一)高校课程与教学论思想

人才培养是高等学校的基本职能,课程与教学是人才培养的两大关键要素,因此,高校的课程与教学也是高等教育研究中最基本的领域。这可能是潘懋元关于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最初探索为什么紧紧围绕高等学校中的教与学问题而展开的深层原因。从思想源流看,他的高校课程与教学论思想从一开始即具有鲜明的科学性与原创性,它并非简单的教学现象归纳或教学经验总结,也并不是对普通教育理论或国外教育思想的简单移植,而是建立在他对高等教育的本质、特点与特殊性的理性认识和对教育基本规律的合理运用上。早在1956年组织编写《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时,他就初步总结了高等教育区别于普通教育、大学生区别于中小学生的特殊性;而在1983年出版的《高等教育学讲座》中,他更将这种认识完整地概括为对高校教学本质的理解。他指出,高等学校教学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教学目标的特殊性,即高等教育是建立在普通教育基础之上的高等专业教育,高校教学应体现指向于特定实践领域的专业方向性;二是教学对象的特殊性,即高等教育的主要对象是20岁左右的青年,高校教学应对学生提出更具创造性、独立性的要求;三是教学过程的特殊性,即高校教学过程是人类一般认识过程和特殊认识过程相结合、学习已知和探索未知相统一的过程,因此应将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引进教学过程。^{[15](97)}潘懋元对高校教学特殊性的理性认识,揭示了高等教育区别于普通教育的本质特点与特殊规律,为科学、全面地理解高校课程教学提供了基本的思路指向。

在对高等教育的本质特征进行科学解释的基础上,根据他对教育基本规律的理性认识,潘懋元就高等学校的教学原则、教学方法、课程组织等问题展开了系统深入的探索,形成了一套层次清晰、结构严谨的高校课程与教学论思想。在教学原则方面,他经过数十年来的研究、实践与修正,提出了高校教学的十大原则,即科学性与思想性相结合原则、知识积累与智能发展相结合原则、在教师主导下发挥学生主体性原则、理论联系实际原则、专业性与综合性相结合原则、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原则、知识的系统性与认知的循序渐进相结合原则、少而精原则、量力性原则、统一要求与因材施教相结合原则。^{[5](247)}这十项原则兼顾一切教学活动中的普遍规律和高校教学过程的特殊矛盾,上承他对于高等教育的本质特征与教育基本规律的理性认识,下启他对于高校具体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组织的系统设计。在教学方法方面,潘懋元根据他提出的教学原则对高校教学通常使用的课堂教学法(讲授法、讨论法、实验法等)、现场教学法(参观法、调查法、实习实训法等)、自学法、科研训练法等进行了科学化、系统化的阐述。在课程组织方面,潘懋元主张既不能墨守传统的前苏联式的学年制教学计划模式,也不能完全照搬美国式的学分制,而应结合中国的历史经验与现实情况,以及高校教育教学的普遍规律,制订具有中国特色的学分制课程教学计划与管理方案。^{[5](293)}

尽管我国自近现代高等教育机构出现以来,就陆续出现了一些与高校课程与教学相关的研究,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这些研究通常止于一般意义上的经验总结,或移植普通教育理论的思路与范式,并未形成兼具学理深度与现实针对性的高校课程与教学理论。潘懋元在高校课程与教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无疑是具有开创意义的。随着这一思想的日渐成熟,他将其运用到更广义的高校人才培养问题研究中,如对大学素质教育的研究、对研究生教育问题的研究、对高校课程教学改革趋势与策略的研究等,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同时,这一思想体系在高校教育教学实践中也得到了推广运用,如潘懋元本人在研究生教学实践中摸索出的“学习—研究—教学”三结合的教学法、“学术沙龙”教学法等,从不同的侧面展现了他的高校课程与教学论思想的实践魅力。

(二)高校教师教育与教师发展思想

教师是高校办学的主体,是高校人才培养与教育教学活动的主要承担者,高校教师群体的学术水平、教学能力和师德,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高校的教育质量、办学水平和社会声誉。潘懋元很早就意识到了教师对于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性,并开始了高校教师相关议题的研究工作。比如,在他 1956 年组织编写的《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中,就有专门章节探讨高校教师在教学中的地位、作用、任务及其与学生的关系等。随着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变化,以及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师范教育的转型变革,潘懋元逐渐将研究视野聚焦到高校教师教育与教师发展问题上。

潘懋元是师范教育出身,曾参加中等师范培训和接受系统的大学师范教育,具有深厚的师范教育理论修养和丰富的师范教育实践经验。同时,作为高等教育理论工作者,他也深知师范教育的发展趋势和适应性变革要求。2004 年,他发表《从师范教育到教师教育》一文,阐明了以“教师教育”取代传统“师范教育”的必要性。他指出,传统的师范教育仅仅强调教师职业的伦理性,是一种封闭、定向的教师职前教育,已不再适应大众化进程中高等教育领域所呈现的新趋势、新变化,应以“教师教育”取代这一概念。与师范教育相较,教师教育具有两大特征:首先,更强调教师职业的专业性,将教师视为一种拥有异于一般知识的专业知识,能够根据特有的专业经验为特定对象提供专业服务的专业化职业,^{16}因此,必须经过专门化的专业教育与专业训练;其次,更强调教育的开放性、多样性与长期性,是一种贯穿教师职业生涯始终的终身教育体系。在 2006 年召开的第四届“高等教育质量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潘懋元发表报告《大学教师发展与教育质量提升》,正式引入“大学教师发展”这一概念。他认为,随着知识经济时代大学成为社会的中心,以及高等教育大众化趋势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出现,大学教师的角色与功能正在发生巨大变化,传统上从外部社会、组织的要求出发建构的教育、培训已不再契合高校教师的成长规律与成长需要,应提倡注重自主化与个性化的“教师发展”。^{[17](503)}结合国际高等教育研究的普遍共识和中国高等教育的实际情况,他在后续的研究中将广义上的高校教师发展界定为“所有在职大学教师,通过各种途径、方式的理论学习和实践,使自己各方面的水平持续提高,不断完善”的过程,^{[18](5)}并将高校教师发展的内涵界定为学术水平的提高、教师职业知识与技能的提高、师德的提升等三个方面,同时对高校教师发展的方式、动力及经验借鉴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系统的研究。

纵观潘懋元高校教师教育与教师发展思想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二者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和理论包容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从宏观层面明确了教师教育与教师发展的基本性质。传统的教师职业缺乏对专业化的重视,传统的教师发展也缺乏专业化的机制,这种专业化的缺失已经严重偏离了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要求,这也是高校教师教育与教师发展问题之所以引人关注的主要原因。潘懋元对教师教育、教师发展概念的解读与论述,紧紧围绕着教师职业与教师发展的专业化而展开。其二,从中观层面明确了教师发展的基本特征与主要模式。潘懋元从现代教师发展的要求出发,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传统师范教育、教师培训中的诸多问题,如强制性、封闭性、短期性等,强调发挥教师发展的积极性、自主性,构建开放化、多元化的终身发展体系。其三,从微观层面明确了教师发展的具体路径与实现方式。潘懋元的高校教师教育与教师发展研究既重视对国外相关经验的引介与借鉴,又强调立足本国的优良传统与实际状况;既重视对普遍性、一般性问题的探索,又强调结合各种具体的高等教育类型,如研究型大学、应用型大学、高职院校等,寻找能够满足不同高校特殊需要的工作方法。

四、高等教育分类发展思想

在世界多国的高等教育发展中,与大众化相伴而生的,是高等教育的多样化发展,它既表现在高等教育类型的多样化上,又表现在高等学校办学模式的多样化上。潘懋元很早就看到了世界高等教育发展

的这一共同趋势,并对我国高等教育多样化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展开了长达近三十年的研究,形成了他的高等教育分类发展思想。他的分类发展思想涵盖各种类型、各个层次的高等教育,以及学历与非学历、全日制与非全日制等各种高等教育形式,然而,其中着墨最多,也最具开拓性、典型性的部分,主要集中于民办高等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和应用本科教育等三大领域。

(一)民办高等教育发展思想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曾出现过私立大学的兴盛时期,但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民办高等教育几乎销声匿迹了。改革开放后,民办高等教育开始得到恢复发展,但是,受制于国家的政策法规和人们的传统观念,民办高等教育长期被置于边缘地位,不仅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反而因诸多歧视和不公平政策的制约而举步维艰。潘懋元是我国最早关心和研究民办高等教育问题的学者之一,也是最早积极支持、推动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行动者之一。早在20世纪80年代民办高校复苏之初,他就指出,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民办高等教育的重现不是不可能的,^{[6](223)}并预见到民办高等教育将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他认为,随着改革开放后城乡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持续发展,民办高等教育的出现有其合理性与必然性,符合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同时,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有利于鼓励社会各方力量集资办学,广开财路,缓解高等教育日益严峻的供需矛盾;有利于调整高等教育结构,促进新的教育体制、办学机制的建立;还有利于社会智力资源的开发。^{[1](341)}从这个角度看,发展民办高等教育将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必由之路,这也为亚洲和东欧多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经验所证明。对民办高等教育历史意义的理性认识,以及对民办高校办学者的情感认同,促使他日益重视并积极推动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1988年,他在《光明日报》撰文,着重阐明了民办高等教育的性质,提出“学校的社会性质,并不决定于经费的来源,而是决定于办学方针、教育宗旨以及体现方针、宗旨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管理制度”^{[1](340)},因此,民办高等教育同样应纳入国家教育体系中,享有与公立院校一视同仁的待遇。这一论述在很大程度上导正了当时关于民办高等教育究竟是姓“公”还是姓“私”的社会争议,使人们开始重新思索民办教育的性质、地位与意义。1990年国家教委委托厦门大学高教所进行“民办高等教育立法的前期研究”,1998年厦门大学高教所成立“民办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以此为基础,潘懋元和他的同事、学生们就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相关议题展开了持续不断的研究。

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一方面取决于民办高校的办学理念、办学方式等,另一方面取决于国家相关法规和改革的支持。因此,潘懋元不仅关心民办高校的内部建设与发展,而且非常重视相关法规和政策研究,努力为民办高等教育发展营造适宜的环境。在他看来,民办高校的发展面临着一系列重大问题,如办学宗旨、独立性与自主性、产权、投融资体制等,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主要在于相关法律、法规 and 政策的完善。在1995年召开的“亚太地区私立高等教育国际研讨会”上,他作了题为《立法——私立高等教育发展的保障》的主题发言,指出立法对于保证私立高等教育质量、促进私立高等教育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他认为,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之下,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立法应着重发挥扶持、引导,而非限制作用;必须明确私立高等教育的社会性质,确保其与国家的社会制度相一致;必须尊重其相对独立性、自主性和灵活适应性;必须公平对待,鼓励竞争;必须明确责任;必须建立评估制度。^{[19](21)}这些论断紧扣当时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所面临的争议、问题和矛盾,为民办高等教育相关法律政策的出台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2002年《民办教育促进法》颁布,这一关键性法律的出台使民办高等教育的法律地位和发展环境有所改善,但仍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潘懋元在《民办高校产权制度改革的若干问题》等文章中指出,产权问题已成为制约民办高校发展的重要法律问题,根据现有的政策法律,民办高校的投资者和法人基本不享有财产所有权,这种延续公立高校管理的思维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民办高校举办者的积极性,需要有进一步的法规或条例对民办高校产权进行规范与保护。^{[20](28)}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颁布后,他又针对将民办高校划分为“营利性”与“非营利”的简单二分法所引

发的矛盾与困境,提出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需要走出区别于“捐资举办的民办高校”和“营利性民办高校”的第三条道路,即“投资举办但不要求取得回报和要求取得合理回报但又不是营利性的民办高校”。^{[21](3)}这一观点对民办高等教育的公益性与营利性问题进行了辩证思考,为民办高校在新时期所面临的法律与政策困境提供了合理的解决之道。

除此之外,潘懋元还对民办高校内部的管理、办学和人才培养质量等议题保持了高度的关注,如建言民办高校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大背景下积极瞄准市场、适应市场经济对高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22](77)}等等,为民办高校在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的路径选择贡献了许多富有创见的思想,得到了很多民办高校办学者的认同。鉴于潘懋元对于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重大贡献与重要影响,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委员会特授予他“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创业奖(理论奖)”。

(二) 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思想

与高等教育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相对滞后。到 20 世纪后期,为适应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需要,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才走上了持续快速发展的道路。潘懋元高度重视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因为在他看来,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关键就在于民办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如果高等职业教育的问题解决不好,大众化的质量将受到整体性的影响。^{[6](228)}与民办高等教育类似,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长期处于被轻视、误解的边缘地位,自身的发展路径与办学模式也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潘懋元将高等职业教育作为其主要研究领域之一。他认为,解决高等职业教育问题的首要条件,是端正学校、教育主管部门乃至全社会对于职业技术教育的认识。早在 1993 年,他就在《必须重视专科教育研究》一文中指出,高等专科教育与本科教育是高等教育系统中同一层次的两个并列的子系统,二者的区别在于培养目标与规格,而不在于年限与水平。专科教育更重视应用技术与工艺,是一种技术性、职业性的教育,其在德、日等国的经济发展中扮演过极为重要的角色。^{[23](54)}这一观点对于纠正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偏见,以及谋划职业教育的现实发展路径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99 年为了适应“大扩招”的要求,我国开始在普通高校中增设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并以“三补一改”等方式增办独立的高职院校,高等职业教育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然而,对职业技术教育的偏见、歧视仍普遍存在,有些甚至是制度化、政策性的歧视,比如,政府对高职院校的财政投入总是远远低于普通本科院校,高考中存在“先本科后高职高专”的录取顺序,公务员和企事业单位在招聘政策上歧视、拒绝高职高专学历等。在《当前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几个主要问题》等文章中,潘懋元将以上问题归结为“正确战略决策和不配套的政策措施的矛盾”,指出政府以高等职业为重点的大众化发展战略是正确的,但在具体的政策措施上并不配套,甚至在阻碍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24](13-15)}因此,必须通过调整有关高等职业教育的政策,如按照办学需要而非学校类型进行教育财政拨款、改革“重学轻术”的招生就业制度、依据行业或岗位而非学科目录来设置专业、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评估标准和评估体系,等等,^{[25](45)}来转变人们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态度与观念。

在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历史与现状,以及国外经验进行充分研究的基础上,潘懋元提出了关于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走向的构想。2003 年,他明确提出,高等职业教育并非一种教育层次而是一种教育类型,不应将高职院校限制在专科层次,应允许它们“升本”,但前提是不能一哄而上,且升本之后还是高职,不能变成普通本科。^{[24](15)}2005 年,根据现代化建设的人才结构、高等职业教育的类型属性,以及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他提出了建立高等职业教育的独立体系。这一体系中的高校应具有更适宜于造就各层次职业技术人才的培养目标、教学计划、课程内容与教学方法,向上应涵盖专科、本科乃至专业硕士、专业博士研究生层次,向下则与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相衔接。^{[26](28)}这一构想的提出引发了教育界的强烈反响,许多学者和办学者认为这一体系的建立将在很大程度上扭转社会对于职业教育的认识,也有助于巩固高职院校的地位,保持职业教育的连贯性,改善高职的办学质量和办学特色。在这一宏观构想提出后,潘懋元又针对如何建立特色化的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如何提高高职院校学生的人文素质、如何构建高职院

校的评估标准、如何谋划高职院校的师资队伍建设等具体问题展开了探索,取得了大量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的研究成果。近两年来,国家的职业教育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教育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等政策文件的颁布,高等职业教育的地位和社会对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立也有了较为清晰的蓝图。当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政策与实践的整体推进方向,大体上符合潘懋元十几年来来的理论预设。

(三)应用型本科教育发展思想

“应用型本科”是近年来逐渐为社会各界所关注的一种高校类型。对于这一概念,目前理论界与实践界还未形成共识,只在大体上用以指称那些以应用型为办学定位,以高层次应用型人才为培养目标的本科院校。十多年来,潘懋元对应用型本科教育保持了高度的关切,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基于从宏观层面对我国高等学校分类定位与高等教育学制改革的总体把握。他指出,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大突出问题,是高校单一化的发展方向与社会多样化人才需求之间的矛盾。一方面,许多高校,无论其办学基础、特色如何,都在谋求向多科性、综合性、研究型的巨型大学发展;另一方面,教育主管部门仍然依循单一化的政策取向、质量观与评估标准来引导高校,更加剧了高校的同质化。这种单一的发展方向与多样化的社会需求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严重影响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健康发展。^{[27](6)}通过参考卡内基教育促进基金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高校分类法,他提出建立类型多样、层次分明的新型高等教育学制系统,将高校分为三种基本类型,第一类是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主要培养研究型人才;第二类是专业性应用型大学或学院,主要培养理论基础宽厚且适应不同层次社会需要的专门人才;第三类是职业性技能型高校。^{[28](7)}目前,第一类和第三类在宏观方向上大体定位明确、道路清晰,而第二类(大部分为应用型本科)应如何在高等教育系统中寻求自身的位置、发挥自身的作用、体现自身的价值,还缺乏普遍性的共识与整体性的擘画,需要给予重点关注。二是基于微观层面对我国近年来大量出现的新建本科院校发展定位、发展取向的具体设计。1999年“大扩招”以来,我国出现了大量的新建本科院校,多为专科院校经合并、重组或升格后形成,不仅数量众多(占我国普通本科高校数量的一半以上),而且门类繁多、情况复杂,历史长短不一、水平参差不齐。这些高校肩负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要使命,理论上应朝着应用型本科的方向发展,然而,它们在办学定位、发展路径、教育模式等方面还存在不少差距,并没有形成成熟的发展模式。

为解决上述两大关键性问题,潘懋元首先从宏观层面对应用型本科进行了清晰的界定,明确了其在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地位与价值。他提出,应用型本科应具有四大基本特点:一是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二是以培养本科生为主;三是以教学为主;四是以面向地方为主。^{[29](10-11)}与研究型大学相比,它应更贴近社会实际,主动适应现代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人才结构,积极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应用型人才;与高职院校相比,二者间虽然有一定的交集和“模糊地带”,但仍存在必要的分野,比如“高职学习的理论够用就行,应用型高校要求理论知识坚实,但不要太厚太深。”^{[30](7)}在具体的发展方向上,应用型本科可以着重向以特定行业为依托,与市场、产业、行业和岗位群紧密联系的“特色型大学”^{[31](33)}发展,也可以着重向立足于地市,为地方生产、生活服务的地方性高校发展。在微观层面的发展路径上,潘懋元则对应用型本科的发展目标定位、学科专业定位、人才培养定位、课程教材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比如,在发展目标定位方面,他提出一方面要从培育自身特色出发,另一方面要从社会需要、市场需求等实际情况出发;^{[32](36-38)}在课程教材建设方面,应从实际问题、实践经验,而非传统的学科理论出发;^[29]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应从培养、引进既掌握专业知识,又熟悉岗位操作,更善于运用教学方法的“双师型”教师出发,^[32]等等。在开展理论研究的同时,他不辞辛劳、亲力亲为,亲自调研、走访了许许多多的应用型本科高校,并积极为这些高校介绍经验、指导工作,足迹遍布全国大部分省份。在这一过程中,他对于应用型本科教育发展的种种构想,也得到了诸多教育决策者和高校领导者的认同,对许多地区的高等教育政

策、许多高校的发展战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潘懋元高等教育思想是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宝贵财富,它不只影响了中国高等教育的理论发展和实践走向,而且受到国际高教界的重视。潘懋元的高等教育思想深刻而恢阔、博大而思精,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实践中发挥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他的元高等教育学思想为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他的高等教育宏观发展思想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擘画了清晰的总体蓝图,他的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思想为高校办学和人才培养工作的完善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他的高等教育分类发展思想则为大众化时期我国不同类型的高校指明了合理的发展路径。本文主要基于他几十年来的研究成果与思想理路,对他在四大范畴、十大领域的主要学术贡献进行了初步归纳与概述。限于文章篇幅与笔者水平,本文对潘懋元高等教育思想的论述难免有疏漏之处,有待在今后更深入的研究中加以补救和完善。

参考文献:

- [1] 潘懋元. 潘懋元论高等教育[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
- [2] 潘懋元. 潘懋元文集(卷二)[M].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 [3] 百度百科:范式[EB/OL].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6218/6845453.htm#viewPageContent>.
- [4] 潘懋元. 教育的基本规律及其相互关系[J]. 高等教育研究,1988,(3).
- [5] 潘懋元. 新编高等教育学[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 [6] 肖海涛,殷小平. 潘懋元教育口述史[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 [7] 陈兴德,潘懋元. “依附发展”与“借鉴——超越”——高等教育两种发展道路的比较研究[J]. 高等教育研究,2009,(7).
- [8] 杜祖贻. 大学正业与国际排名孰重? ——序潘懋元教授《借鉴——超越: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路径研究》[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9,(1).
- [9] 潘懋元. 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论与政策[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
- [10] 百度文库:中国历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数据一览(1978-2012)[EB/OL].http://wenku.baidu.com/link?url=AGWfgD0ffB-0lD-nhtNZXVHhSn2JBnjPVT974ywxAXx1Skill6d_68CjB0ZsQZ0EYK7ObAyZvSKA2BZZoOeFjj8JBP5z-G9owxyZQcTpNaFm
- [11] 潘懋元. 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J]. 中国高教研究,2001,(12).
- [12] 高志敏. 关于终身教育、终身学习与学习化社会理念的思考[J]. 教育研究,2003,(1).
- [13] 希建华. 中国远程与高等教育印象——访我国高等教育学泰斗潘懋元先生[J]. 开放教育研究,2005,(2).
- [14] 潘懋元. 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 [15] 曹如军. 潘懋元先生的大学教学思想探析[A]. 潘懋元高等教育思想研究论文集[C]. 厦门: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2008.
- [16] 潘懋元,吴玫. 从师范教育到教师教育[J]. 中国高教研究,2004,(7).
- [17] 潘懋元. 潘懋元文集(卷三)[M].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 [18] 潘懋元,罗丹. 高校教师发展简论[J]. 中国大学教学,2007,(1).
- [19] 潘懋元,魏贻通. 立法——私立高等教育发展的保障[J]. 高等教育研究,1996,(1).
- [20] 潘懋元,胡赤弟. 民办高校产权制度改革的若干问题[J]. 教育研究,2002,(1).
- [21] 潘懋元,邬大光,别敦荣. 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第三条道路[J]. 高等教育研究,2012,(4).
- [22] 林金辉. 潘懋元高等教育思想[M]. 广州:广州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 [23] 潘懋元. 必须重视专科教育研究[J]. 上海高教研究,1993,(4).
- [24] 潘懋元. 当前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几个主要问题[J]. 高等职业教育(天津职业大学学报),2003,(6).
- [25] 潘懋元. 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对当前高等职业教育的启示[J]. 教育研究,2007,(1).
- [26] 潘懋元. 建立高等职业教育独立体系刍议[J]. 教育研究,2005,(5).
- [27] 潘懋元,吴玫. 高等学校分类与定位问题[J]. 复旦教育论坛,2003,(3).

- [28] 潘懋元,石慧霞. 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历史探源[J]. 江苏高教,2009,(1).
[29] 潘懋元. 什么是应用型本科? [J]. 高教探索,2010,(1).
[30] 赵文青. 对我国应用型本科院校发展战略的思考——潘懋元先生访谈录[J]. 高校教育管理,2014,(1).
[31] 潘懋元,车如山. 特色型大学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与作用[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8,(4).
[32] 潘懋元,车如山. 略论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定位[J]. 高等教育研究,2009,(5).

The Outline of Pan Maoyuan's Higher Education Thoughts

Bie Dunrong Li Jiabin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Pan Maoyuan's researches and literature on higher education are valuable asset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discipline in China. They have not only affected the dire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but also received atten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communities. With strict structure and huge system in his thoughts, it almost covers all fields of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es. Overall, his thoughts on higher education mainly include the meta-higher education thoughts and the thought of educational basic rules, which represent by the thought of higher education discipline paradigm; the macro-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thoughts which represent by the thought of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road, the thought of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popularization, and the thought of lifelong education; the universities education thoughts which represent by the thought of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in universities, and the thought of teacher education and teacher development in universities; as well as the higher education classification development thoughts which represent by the thought of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the though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he thought of applied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and so on. His higher education thoughts are not only the cornerstone of higher education discipline in China but also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Key words: Pan Maoyuan; higher education thoughts;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es; higher education discipline

责任编辑:岳广腾